

现代中国区域研究基地合作项目 第一届国际学术研讨会
转换现代中国研究的范式

研究基地合作项目总代表 毛里和子（早稻田大学）

■本项目的四个课题

我认为日本的现代中国研究在世界上具有相当高的水平。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研究跟上了 21 世纪以来在中国发生的急剧变化。如果只把北京、上海等最发达的地区作为研究对象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经济蓬勃发展和“市民”正在逐渐出现的中国。如果往贵州的农村去走走，展现在你面前的又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中国，当地的贫困以及贫富悬殊会让你感到震惊。可以说，不断涌现的信息洪流和微观数据已经让我们无法看清中国的全貌。

处于巨变之中、并且日益庞大的中国，无论是在地区还是在阶层方面，都呈现出无限多样化的趋势。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为了能更好地了解和把握中国，现代中国区域研究合作项目于 2007 年 8 月正式启动。本项目共有四大课题。①将分散于各地的研究人员及研究机构的各项活动进行汇总并加以组织化。具体来讲，就是先在各研究基地之间建立起松散的横向网络。②面对“中国向何处去”这一问题，运用人文、社会、自然等各学科来对中国进行综合性研究。在此过程中，加强跨学科的研究固然重要，尤其有必要系统地推动与我们的研究对象——中国——的研究人员、研究机构的联合研究活动。③通过召开各研究基地之间的联合研究会以及构建信息网络等来培养一批具有国际水平的年轻一代中国研究人才。④提高有关当代中国研究的各种文献、信息、数据的透明度，并促进相互利用。（遗憾的是，日本在这方面已经远远落伍于世界）。可以说，这些都是一些棘手的课题。

■研究正在大转型中的中国时所面临的困难

自 1996 年起的 3 年之间，我们开展了“现代中国的结构变动”这一大型研究项目，总计大约有 70 余人参加了此项目。自那以来已经将近 10 年过去了，中国的“结构变动”不但没有停止，反而变得越来越复杂。借用黄宗智（Philip Huang, UCLA）的话来说，其中充满了悖论。最近每当我去中国，都会觉得“何为中国”这样的笼统的设问已显得毫无用处，这让我略感沮丧。当今的中国正处于史无前例的“转型期”。把握现代中国之所以会如此之难，我想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因素。

第一是其巨大的规模。如此规模巨大的现代国家是史无前例的。也许正因为如此，作为经验科学的社会科学也就显得有些力不从心。

第二是现代中国所具有的多种属性。单现在能想到的就有以下 5 种。曾经是

世界文明古国的历史及其遗产、半殖民地以及后殖民地国家的特性、曾经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及其遗产、既是一个庞大的发展中国家又是一个 GDP 即将排行世界第三的全球性核武器大国。这 5 种属性是如何相互关联、相互作用而形成现在的中国的呢？要想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可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

第三是每个领域各有不同的变化方向、向量。经济上是“汹涌澎湃的市场化”，政治上却是在“回归到传统”。而社会方面呢？我们甚至连大致的方向都摸不清。中国的各个地区、农村和城市之间都完全不同，我们很难把“市民社会”假定为中国社会未来的发展目标。

第四是地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日益扩大的贫富悬殊正在导致各地区之间形成结构上的差异。认清这一点关系到我们能否回答“微观的调查研究究竟有何用处”这一根本问题。比方说，即使我们要了解“村民自治”的现状和功能，可是经常会是，由于“村”以及“村”周围的情况的截然不同而使得结果完全不同。要知道，在中国有 90 万个村落遍布全国。还有，在分析中央和地方关系时非常重要的要素就是“县”，可全国各地光“县”就有 1500 个，“县”一级政府就有 2900 个。难道我们能对它们都进行调查研究吗？

■中国研究的范式转换

明清史专家黄宗智在 90 年代中期曾经论述过有关“中国研究范式的危机”。他指出，有关明清时期中国的“封建制度的停滞论”、“资本主义萌芽论”都已走到了理论的尽头。他认为，关于范式，此前的研究者之间普遍存在诸如“商品化是现代化发展的前提”、“工业化和农业化会同时并进”这样的“默认的前提”。可以说这些“默认的前提”普遍存在于用于分析的各种概念之中，而这些概念是各不相同的甚至是意思截然相反的。不仅如此，这些“默认的前提”至今亦未被提及。基于这些，黄宗智强调说，我们有必要对这样的“默认的前提”重新加以质疑。在此基础上，他还指出，从中国及中国的历史上我们可以看到诸多“悖论”。如阶层化的自然经济和经过整合的市场、公共领域没有随着市民势力的壮大而扩大（国家对公共领域的霸占）、没有与市场化同步建立市民社会等。而这些“悖论”告诉我们，现代中国的研究正需要范式的转换。可以说，黄宗智的这些观点即使在现代中国也是完全适用的（黄宗智 1994）。

另外，在“现代中国的结构变动”研究项目中，我把中国的变动分为了三个阶段：即第一次结构变动阶段、第二次结构变动阶段以及体制变动阶段。依我看来，中国从 1990 年代后期开始进入第二次结构变动阶段，此阶段的主要特征是中国社会的各领域正进行着从二元结构到三元结构的本质性的转变（诸如中央与地方和基层、国家与半国家和社会、都市与半都市半农村和农村、工人与农民工和农民）（毛里 2000）。这对于研究正处于迷茫之中且日益向各方向分化的中国来说不失为一个新的探索。

身为经济学家的加藤弘之也是范式转换观点的支持者之一。迄今为止，在毛泽东时代我们讨论的是究竟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而在邓小平时代则是究竟是激进主义还是渐进主义。加藤认为用这样的二元论范式已经无法理解中国的变化。同时他还指出用盎格鲁萨克森模式或者东南亚模式都无法解释“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体系”这条道路。为此他强调中国研究需要以地区和地方政府特有的经济功能，即“体现于经济体系上的地方分权特征”这一中国固有的特性为出发点（加藤弘之 2003）。

范式危机的出现并不仅仅局限于中国研究这一领域。从事亚洲经济研究的原洋之介就对光用市场化和民主化来解释亚洲的诸多社会现象这一情形提出了质疑。他强调指出，只要承认经济制度是由文化及其背后的历史过程所决定的，我们就有必要从一定的社会以及文化脉络中去构建其固有的经济体系的演变模式（原洋之介 2003）。

■几种模式的素描

可是，要实现范式的转换并不容易。想必今后中国研究之路也将依然荆棘密布。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以下这些“答案”，换句话说就是作为中国今后的目标模式来展望一下“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在此，我将依据部分中国学者最近所作的研究中所提出的各种观点对中国的走向做一素描。

♣ 通常的现代化模式

也就是说，虽然承认各种“中国特色”的存在，但是认为其最终发展方向是民主化和市场化。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模式明确地提出并倡导民主化。（而关于市场化问题，这一模式认为：从表面上看中国正经历着突飞猛进的经济的发展，但事实上，就像土地和房地产的状况所显示的那样，国家或小国家即地方依然是支撑着中国经济的非常重要的内在因素，具有强烈的“中国特色”。）

举个例子来说，在2004年~2005年期间，曾经发生过有关信访制度的激烈争论。针对许多人都赞成将信访制度化或进行改革这一情况，于建嵘（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等人则明确主张废除信访。他们认为，有关信访的很多现行规定都与宪法相抵触。而且他们认为，2005年1月制定的“信访条例”恰恰是“束缚民众”的，而不是“限制干部”的条例，是中国传统的官本位主义、政府万能主义的体现。由此，他们对该条例进行了猛烈的批判。看得出来，他们心目中所描绘的未来中国就是通常的现代社会模式。

♣ 回归到传统的模式

有人似乎对改革开放30年来毫无进展的中国的“民主化”失去了耐心。为此，已经有一些知识分子认为“民主化不可能解决中国的问题”，主张回归到传统、特别是儒家思想才是未来中国的出路所在。康晓光（中国人民大学）就是主张这个模式的代表人物。康晓光在1990年代曾经主张，中国的权力应该致力于对“社会

公正”这一新的正当性的合理分配上。据他所言，在 1990 年代后期的中国就开始出现霸占了政治资源和经济资源以及文化资源的“精英联盟”，造成了“行政吸纳政治”，而这也保证了中国政治的稳定。此外，他率先推动儒学式的“传统文化复兴运动”，并认为儒家文化的复兴会对中国的稳定发展、和平崛起发挥积极作用（康晓光 2007）。

从诸如中国政府作为本国的“文化外交”在世界各国推动“孔子学院”的普及、民间书院的盛行以及在中国各地流行读经等可以看出，回归传统这一现象非常明显。此外，宗教意识的淡漠、宽容的教导、追求安定和秩序的保守性、集体主义的价值取向、道德本位的政治权力意识等，这些都在影响着中国外交。有的国际政治学者主张说，这就是中国为什么提倡“和平崛起”的原因所在（楚树龙等 2007）。

我想当遇到困难时，也许对于任何人来说“回归到传统”都是一个容易做出的抉择吧。

♣ 东亚模式

中国国内有关东亚模式的看法有些微妙。一般来讲，支持这一模式的人大多数都以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为其前提的（王梦奎 1998）。但是，反过来也有人把这一模式应用到中国持批判意见。其中，北京大学的陈峰君就认为权威主义是东亚各国“不得已而采用的过渡性体制”。在此基础上，他对逐渐向“亚洲式民主政治体制”迈进过程中的东亚、尤其是台湾的经验给予了高度的评价（陈峰君 1999）。

我本人也认为，把东亚模式视为中国的目标模式的观点还是有用的。通过 COE-CAS “现代亚洲学的创生”的研究我们得到的结论是，东亚的政治社会具有以下一些共同特征：①公领域和私领域的相互渗透（政府党体制等）。②与“契约”不同的“相关性”网络。③集体主义与温情和依赖、资助与委托关系等政治文化和权力观念。④东亚的社会和地区关系所具有的浓厚的混杂性等（毛里 2007）。拿考察包括日本在内的东亚地区的历史以及现代时所用的框架，去投影中国的今天、明天及后天应该说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

最后剩下的第四个模式就是“中国独到的模式”。但是，在我们作如此主张之前，毫无疑问有许多理论方面的工作有待我们这些研究中国的人去做。

虽然中国已经不是那么容易把握了，不过中国研究还是颇具挑战性、并充满魅力的一个领域。包括本研究基地合作项目在内，现代中国研究今后所需要做的，我想有以下几点：①要做好至少持续 20~30 年的思想准备，积累对经济、社会、政治各领域的微观定点观测调查。而且我们的调查必须是在既有假设又有明确的概念的基础上进行的。②在许多领域都要大力推进与中国学者和研究机构的联合

调查研究活动。③善于进行纵向的历史比较和横向的比较，并致力于建构新的模式。

参考文献

- 黄宗智，〈中国研究的范式危机：社会经济史上的悖论〉，《中国-社会和文化》第9号，1994年6月。
- 毛里和子，〈关于中国的结构变动与体制变化〉，〈中国向何处去〉，毛里和子编《现代中国的结构变动：如何看大国中国》东京大学出版会，2000年。另外，在有一个关于“农民工”的研究中指出，传统的二元结构论有其明显的不足，中国社会正朝着向三元结构转变，其中农民工在这个三元结构中是一股重要的势力。（马用浩/张登文/马昌伟，〈新生代农民工及其市民化问题初探〉，《求是》2006年第4期）
- 加藤弘之，〈超越普遍主义：现代中国研究的50年〉，《现代中国》第75号，2001年10月。
- 原洋之介，〈亚洲学的方法及其可能性：笔记一则〉，东京大学东洋文库研究所编《亚洲学的未来像》东京大学出版会，2003年。
- 于建嵘，〈信访制度改革与宪政建设〉，《二十一世纪》（香港、网络版）2005年7月号。
- 黄锺，〈信访制度该废除了〉，《搜一百范文》2006年3月。
- 康晓光，〈再论“行政吸纳政治”：90年代中国大陆政治发展与政治安定研究〉（2007年12月在参加法政大学学术研讨会的使用的稿子）。还有，根据对2007年的传统文化复兴运动的调查分析而写的《中国归来：当代中国大陆文化民族主义运动研究》（2007年，草稿）。
- 楚树龙等，〈传统文化对当代中国外交的影响〉，《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12期。
- 王梦奎，〈亚洲金融危机与中国〉，《求是》1998年第21期。
- 陈峰君，〈金融危机后对东亚模式的再思考〉，《现代国际关系》1999年第3期。
- 毛里和子，〈设计“东亚共同体”：对现代亚洲学的挑战〉，山本武彦/天儿慧编《东亚共同体的构筑①：区域形成的新思考》。